



《梁溪集》与选人用人

《梁溪集》是南宋抗金名臣、民族英雄李纲的心血之作，收集了其一生所作的诗文、奏议、书信、史论、题跋等文章，汇聚成一百八十卷，也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李纲官至宰相，注重为朝廷选拔人才，深悉功以才成、业由才广的道理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识人、选人、用人观。

王志强 胡超

选拔人才的三个标准

“才尽其用”的前提和基础是发现真正的人才。韩愈有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之说，感慨高才俯居民间而无人发觉、达士侧卧陋巷而无人问津的社会现状。《梁溪集》立足于宋朝人才选拔中的实际经验，总结出人才应具备三个特质，即志向远大、骨鲠敢言和知机。

真正的人才，在思想上有着远大的志向。在《梁溪集》中，李纲纵观古今，指出历史中能够立下不平凡功绩的人，都是有着不平凡志向。倘若志向卑微，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，那么就on易让人掉入心满意足、嬉游懈怠的陷阱，生出骄傲自得、苟且偷安的心思。贤才志向远大，也要在磨炼中不断砥砺自我。

真正的人才，在道德上要能够骨鲠敢言。《梁溪集·迂论》以三国历史为例，指出吴国张昭的直言直谏对吴国的安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，直言不屈的张昭让敌对的魏国敬畏不已，不敢肆意发动侵略战争。《汉书》载汉武帝时的汲黯骨鲠敢言，这让淮南王刘安有反叛之心却不敢发动叛乱。极言直谏之士，有着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”的道德追求，秉义而为，持道而行，上可以匡谏皇帝的过失，下可以反映百姓的诉求，时时体现骨鲠敢言的品质。

真正的人才，在行动上要能够掌握时机。《梁溪集·奏议》多次谈到把握时机的重要性，认为它是转危为安、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。在《梁溪集》看来，把握时机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品质，不但要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，而且还要有刚毅果决的行动力，只有二者兼备，才能够“不失机会”。

任用人才要“不疑于心”

对于如何使用人才，《梁溪集》的基本观点是，疑人勿用，用人勿疑。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才，方能相契

相知，同心合力。

《梁溪集·论偏霸之王专任其臣》中谈到君主度量广阔的问题，感慨孙策和张昭君不疑臣，臣不背君，风云际会，其斯而已。孙策气量宏伟，对北方士大夫将江东繁荣昌盛归功于张昭的行为，没有任何的不满，反而认为张昭是自己所用的人才，张昭的功劳就是自己的功劳。孙策深刻明了为君之道，气量宏大，没有因为士人对张昭的夸赞就对张昭生出怀疑嫉妒之心，而是仍然深信不疑，表现出了应有的气量。这种气量在《梁溪集》看来就是“心平心正”。“心平”是无偏无倚，公正无私；“心正”是坚毅刚正，直道行事。身居上位者心中有原则，知道谁是做事的人才谁是混日子的庸才，就可以看破他人的离间和谗言，坚持对人才的信任之心。心平心正，就不会因为人才遇到些许小问题小挫折就对他产生怀疑，而是继续在身后为他们保驾护航。北宋大儒司马光也曾提出“心明”是上位者必备的品质，他在《上神宗论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三》中说，上级刚直心明，心中有杆原则的秤，自然知道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，就不会出现亲小人远贤臣的事情。

使用人才，核心在于信任人才。能够信任人才，事情才可以做成，否则事功将在猜忌怀疑中毁于一旦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猜疑之心一生，诸事皆废，前途尽毁。多疑者因心气不够刚正，一会儿相信这个，一会儿相信那个，改来改去，最后一事无成，这是李纲在《梁溪集》中最为惋惜的事。

“久任责成”才能够人尽其才

对于如何让人才才尽其用，《梁溪集》总结过往历史得出“久任责成，不妄罢易”的结论。程颐也指出，笃信人才，他能诚心做事；专任人才，他能才尽其用；礼遇人才，他能有所归属；考核人才，他能不辱使命。

宋代对臣属的权力采用分散与削弱的方法，有效地减少了官员只手遮天、尾大难掉的可能性，但同时也使官员办事效率不高，难以有效地开展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工作。当要做成一番事业时，非上下同心，将手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可，否则不足以成大事。政出一门，专命专任就是《梁溪集》针对现实的困境而提出的解决方案。

事实上，以“久任责成”来管理人才，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。中兴汉室的汉宣帝就认为反复调整地方官员会让他们难以尽心尽力，所以在他在位期间，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往往较长，社会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干练的能吏名臣，史称“汉世良吏，于是为盛”。宋仁宗时期的孙甫在讨论地方官吏的久任责成问题时也提出，对于经过考验、可以信任的人才要放心地使用、大胆地使用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发挥出真才实干。

《梁溪集》反复强调让人才能够展尽底蕴的条件在于放权，这才能让他们彻底发挥出自己的才干。既想让下属干出一番事业，却又制定各种条条框框去约束他们、防备他们，这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。北宋大臣范祖禹指出历代王朝之所以事功不建，功业不立，原因就是没有专任大臣，没有给予大臣充分的信任。

但是，《梁溪集》也强调，久任责成的前提在于知人，在于审慎地选拔出切实可信的人才。因为真正的人才一片赤胆忠心，有着拳拳报国之心，专任其人，他会因感责任重大而尽心尽责；但假使是奸佞小人，则不可专任，因为奸佞小人徇私舞弊，无不为己，专任其人，则只会败事。概言之，知人是用人的基础，而才尽其用是知人用人的最终目标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《新华日报》招待战地记者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5月。当时，由中共长江局直接领导的、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《新华日报》在汉口举行招待会，欢迎从台儿庄前线凯旋的战地记者，并鼓励他们据实向军事委员会反映前线情况。

1938年4月上旬，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众志成城、浴血奋战，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、矶谷两个精锐师团1万余人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。5月下旬，从徐州突围的40多名记者先后安全回到武汉。

5月27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举行招待会，和战地记者们欢聚一堂，围坐在一张长形的餐桌边畅所欲言。

《新华日报》社长潘梓年作为东道主首先致欢迎词，接着由《新华日报》总编辑吴克坚代表报社致慰问词。他表示，在徐州突围时，不仅担心《新华日报》特派记者陆诒的安全，也担心其他各报记者的安全，“现在见到你们安全地返回汉口，由衷地高兴”。他说：“诸君在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，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的，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，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不够深入，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密切，民众疾苦，还有许多没有解决，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，所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，这不仅国人的希望，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最后，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出空前团结。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，这种互助



团结的精神，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，而且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。”

范长江在发言中说道：“过去各个报社只是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，没有一个报馆会对我们举行全体慰劳的。今天《新华日报》不仅慰劳他的记者陆诒先生，而且慰劳我们大家，使我们非常兴奋和感谢。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们全体举行慰劳，都是以前所没有的，新闻界由狭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”

范长江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成立分会的情况，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现。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，在徐州危急时候不顾个人安危，想留下继续采访战地新闻。同时，他还希望

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上的困难，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好。

在招待会上，各位记者经历了战场上的生死考验，劫后重逢，感慨很多，他们除了叙述在徐州突围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，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、奋勇抗敌和民众奋不顾身、踊跃支前的英勇事迹，还讨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一些问题。

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，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。他于5月26日专门给范长江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慰问：“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的英勇的电讯，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，不仅使人兴奋，而且使人感念。闻前线上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，特驰函致慰问于你，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。”

当周恩来得知记者反映的一些情况后，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。他约范长江和陆诒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详谈。他认为记者们反映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、军民关系和军队政治工作等问题都很重要，并约定时间请范长江等20多位记者到汉口军委会政治部一起座谈。

这次招待会隆重热烈，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。会后，全体人员合影留念。王明、博古、凯丰、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和《新华日报》等报社的负责人主动站到后排，让前线归来的战地记者坐在第一排，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。

郑学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